

【编者按】2011年7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90华诞。在这90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带领我国人民向富强、民主、文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阔步前进。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本刊特开辟“纪念建党90周年”专栏,上期选登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论文,本期从党史研究、作风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和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选取了一组文章,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我党的光辉历史、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并表达我校广大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之情。

感悟历史 面向未来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笔谈

南京审计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

(南京审计学院 政治与行政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史和党建理论的研究。党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当前及今后的一段时期,对于研究者而言,还有若干问题是需要高度重视并加以切实解决的。在思想作风建设方面,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九十年。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在我国经济转型期,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注重社会的公平、公正。

关键词: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人物;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和谐社会;利益共享,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D26;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1)03-0001-08 收稿日期:2010-03-12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几点看法

吴汉全(南京审计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有九十年的历史了。如今,中共历史的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需要我们提出和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但我觉得,在当前及今后的一段时期,对于研究者而言,以下几个问题是必须高度重视并加以切实解决的。

(一)关于从社会变迁角度深化中共历史的研究

我的导师张静如先生多年来倡导的“以社会

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思想,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研究中共历史,是把中共放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之中,探讨它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关系,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社会演变之中产生的、带有中国特点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一方面要研究清楚中国共产党是在怎样的社会情形之下产生的,是怎样的社会实际状况决定中国共产党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另一方面也要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推进近代中国社会前进的,它对近代中国历史演变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对中华民族的复兴负有怎样的历史使命。过去,我们更多是从中国政治的角度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革命史观”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事实上也取得了很多的

研究成果,然而,仅从政治的视角而不是从社会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但会使丰富多彩的中共历史仅仅成为政治史之一,而且还很难说清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变革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的情形,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经济变革、文化进步、社会建设等方面的贡献就难以凸显出来。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研究中共历史,就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前提下,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来研究中共历史,展示中国共产党在广阔的社会视阈中的历史活动及贡献。我认为,要使中共历史真正地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从社会变迁视角深化研究工作是今后的一个努力方向。

(二) 关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中,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排除在外,中共历史也就失去了灵魂性的内容。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个热点,但有些学者的研究往往与中共历史研究相脱节,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领导和组织作用,这是很不应该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首先要搞清一些基本概念。学术研究是以基本概念为前提的,概念不清,逻辑混乱,如何研究?我曾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化”、“结合”、“成果”等几个概念,目的就在于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些概念。

其次,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梳理清楚,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体现出来。

最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除了概念的界定和过程的梳理外,体系的建构同样是不可缺少的,这就需要在理论思维上下工夫,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的东西,如此才可能将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的研究推进到科学的层面。

(三) 关于中共领袖人物与一般民众关系的研究

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自然要研究中共领袖人物,这是无可厚非的。我本人也是从研究李大

钊起步,以后逐步涉及其他中共领袖人物的。问题是,如果仅仅着眼于著名的中共领袖人物而不能再现一般民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则中共历史的研究必然会缺乏根基。我们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在研究之中有几位研究者能够下工夫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研究一般民众呢?张静如先生强调研究“个人和群众与党史学”问题,认为“研究者都强调要反映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但落实到讲义、专著上,则十分薄弱。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所占数量少,一个是不够具体”^[1]。我认为,在中共历史研究之中,不能说研究者全然不重视民众,但民众在研究者的笔下大多被抽象化、概括化了,总体上看,研究者的精英意识还是较为突出的。我并不是说领袖人物研究不重要、今后不必研究,相反,领袖人物研究今后还要加强。我所要强调的是,在我们的中共历史研究中应更多地体现一般的历史人物,将一定的笔墨用在那些普通的劳苦大众方面。今后,如果能够将一般民众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在中共历史中更具体地表现民众的作用并正确地解说好中共领袖与普通民众的关系,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将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四) 关于中共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研究

在中共历史研究中,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历来是重视的。近年来,在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文化代表者”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已被提到研究的日程上。在我看来,文化建设中学术文化建设及其成果是核心的内容,理应引起研究者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学术建设,注重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譬如,1930年5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邓初民、吴黎平等三十余人出席。“社联”是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组成部分,除创办机关刊物《社会科学战线》外,还先后创办了由会员柯柏年、王学文、许涤新、何干之等人分任主编的《研究》、《新思潮》、《社会现象》、《时代论坛》等刊物,并由吴黎平、杨贤江、李一氓、艾思奇等人翻译和编写出版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及《马克思论文选译》、《哲学讲话》(即后来出版的《大众哲学》)等著作。又譬如,1938年5月成立了中共

中央马列学院,张闻天兼任院长,下设历史研究室、中国政治研究室、中国经济研究室、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中国教育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室等,集结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与方法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等问题,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著作。张静如先生在给拙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概论(1919—1949)》所作的“序”中指出,要高度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这种研究必须“紧密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要有社会史研究的眼光”,“要紧密联系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动”,“要依据新的视角与时俱进地加以诠释”^[2]。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构建的关系,是值得中共历史研究者今后深入研究的一个大课题。

(五) 关于从现实来研究中共历史的问题

关于现实与中共历史研究的关系,学术界有两种倾向:一种主张中共历史的研究不要与现实挂钩,而要进行所谓的“纯客观”的研究;一种主张以现实的需要来研究中共历史,以现实的需要为尺度。我的看法是,中共历史的研究不可能不与现实相联系:其一,我们这些研究者的历史观都是当今时代的历史观,不能与现实完全脱离开来,也没必要与现实之间划出鸿沟。其二,我们的研究工作都是以现在的知识体系为基础的,使用的概念、话语都是时代的产物,怎么能使研究工作处于现实之外呢?其三,任何研究者都有现实的关怀,不可能埋头于故纸堆之中,都会以其研究工作表达对现实的认知并参与历史的创造。其四,我们的研究对象既是历史中的对象,又是现实社会变革运动的领导者,而且历史本身也有其内在的连续性,因而研究工作本身也就需要有历史与现实相对接的研究思路。

诚然,强调现实与中共历史研究的关系,也不能以现实需要作为研究工作的唯一宗旨,那样就很难使中共历史学成为科学的学问。就我个人的研究工作而言,我也是在导师指导下从现实高度来研究中共历史的。譬如,现代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都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作出了贡献,这就需要我们以时代的现代化理论对中共领袖人物的历史贡献加以新的梳理。“现实”是研究工作的当下语境,中共历史研究不能置之度外。现在的政治学研究中出现了

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相偏离的现象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传统相脱离的倾向,而我认为,中国当今的政治学必须接续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传统,必须充分地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本土化资源。

总之,我认为要从现实来研究中共历史问题,但不主张将学术研究等同于现实政治,而是希望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有一个基本的界限。

(六) 关于中共历史学理论体系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是一部改变中国历史前进方向的辉煌历史,值得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加以研究。而要能够科学地研究和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则需要有独特的中共历史学理论体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的导师张静如先生不仅身体力行地研究中共历史,而且倡导建立我们自己的中共历史学理论,他本人也构建了一个关于中共历史研究的中介理论。对此,我曾撰文加以介绍和评价^[3]。今后,中共历史学理论体系仍需要进一步构建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不断完善,这对中共历史的深入研究意义重大。

那么,如何构建中共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呢?我的看法是: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作为构建中共历史学理论的指导理论。第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具体地研究中共历史的全过程,总结研究中所得出的规律性的结论。第三,将中共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科学结论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予以高度抽象与概括,从而形成既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又有我们自己的研究特色的中共历史研究理论。第四,充分吸收我们时代的理论成果与学术成果,在人文社会科学所构成的现代知识学的视野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奠定基础的学术系统中,不断完善中共历史学理论体系。自然,我们吸收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仍然要确认中共历史学的历史学性质,并在此前提下揭示其基本内容。我在给自己研究生讲课中,曾借鉴历史学的研究路数阐发中共历史学的学科体系,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一是这一学科体系包括以中共的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诸学科。这样,以研究的空间范围来分,有中共地区史、中共地方史等;以研究的时间跨度来分,有通史、断代史等;以研究主体历史活动的具体领域来分,有各个专门史。二是这一学科体系包括以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历史资料为研

究对象的诸学科。这里就有以中共历史的实物史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中共历史文物学、中共历史考古学等;有以中共的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的中共历史文献学。三是这一学科体系包括以中共历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诸学科,主要是中共历史学理论和中共党史学两个分支学科。我这个看法不一定对,但或许对于中共历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有点参考作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九十周年,我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把自己近来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写了出来,以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解放思想永无止境

卢国琪(南京审计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副主任,教授)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回顾党的辉煌历程,我们一定要牢记一条真理:解放思想永无止境。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九十年。

(一)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从创立之日起就与解放思想相伴。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顺境中没有忘记解放思想,在逆境中同样没有忘记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不断推进并有新的发展,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把它与新的实际结合起来,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他们生活在十九世纪,分析问题的立足点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正是基于对这种现状的分析,他们才预言在欧洲、北美的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同时发动并同时获得成功。不可否认,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们的预言是有科学性的。可是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并没有教条地信从,列宁考察问题的立足点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正是把握了这一规律,勇于解放思想,并与新的实际结合起来,列宁才得出了新的科学的结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因为列宁有一种解放思想的政治勇气,所以他才不会拘泥于马克思和恩格

参考文献:

- [1]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 [2]吴汉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概论(1919—1949):上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 [3]吴汉全.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创新——读张静如近年来的党史学著作[J].党的文献,2003(1):91-94.

基金项目:教育部2009年规划项目(09YJA710036);国家社会科学2010年一般项目(10BKS011);江苏省教育厅2010年项目(2010SJB710008)

斯的词句,果敢地把新的实际情况作为新理论的唯一参照系。正是由于有列宁正确理论的指导,俄国人民才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过程中显示了解放思想的政治魅力,同样,解放思想也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最善于解放思想,他坚决反对“本本主义”,一贯主张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概念是毛泽东首次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推进的。在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创造性地开辟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与共产党人善于解放思想密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断形成的理论成果,都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分别于党的七大和十五大写进党章并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一种不断解放思想的正确政治选择。同样,党的十六大与党的十七大分别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写进党章,也是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解放思想的结果。

值得强调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而且它是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

作新要求的反映,它所包含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这一成果逐步形成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解放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继续推向前进,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三个层面的意义:其一,它是一面旗帜,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我们要高举这面旗帜;其二,它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三,它是一条道路,是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文明、和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坚持和新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我党最可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且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在当代中国,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断解放思想的政治逻辑。

科学发展观是我党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是在总结我国发展实践经验和借鉴别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使党和国家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更加完善,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毫无疑问,解放思想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始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会把不断解放思想化作前进的动力,这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充分说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领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1]284}。

(二)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九十年

解放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身就是“思想大解放”结出的成果。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解放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根据不断发展和变化了的客

观实际制定相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共二大制定了我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简而言之,最高纲领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最低纲领就是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建立中华民族独立的新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思想过程中的成熟的政治思考,自此,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这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1]292-293}中共三大更是具有解放思想的勇气——这次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作出这一决定是当时建立统一战线的迫切需要。后来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屠杀革命者,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可是当国共两党对峙十年之后,在抗日民族战争的洪流中,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的利益,再一次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坚持解放思想,主动与国民党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解放思想的勇气,就没有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的可能。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民主革命时期,每当历史处在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解放思想作为精神动力,结合当时的实际,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同样如此。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每一个重大的理论建树,每一次改革攻坚的成功,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特别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堪称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促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这份“宣言书”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他把解放思想提到了相当的高度。

当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再次发布了解放思想的“宣言书”。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思想禁区,创造性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

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373}。邓小平对此特别作过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3]363}正是在邓小平不断解放思想的推动下，中国才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又继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解放思想永无止境，这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证明，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所证明。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条主线，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的一条主线。既然如此，共产党人要继续谱写党的历史，要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又怎能割断解放思想这条主线？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我们现在强调要解放思想，就是“要使广大干部群众深深懂得，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在不断变化，

我们必须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要使广大干部群众深深懂得，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必须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不断解决前进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要使广大干部群众深深懂得，只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才能永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4]。

参考文献：

- [1]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84.
- [2]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3]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胡锦涛. 在会见中央十六大宣讲团成员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02-12-16(1).

论和谐社会的利益共享

任德新(南京审计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最近三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各原有阶层的利益均衡被打破，不同阶层、不同区域利益出现了巨大变化，贫富差距拉大。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很低，但近些年来这一指数快速上升，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资料，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6，占全国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只占全国总收入的4.5%，而占全国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70%。这表明，在我国转型期，社会财富虽然迅速增加，但全社会并没有充分共享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

“和谐社会”的内涵丰富而深刻，最先出现在题为《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党的十六大报告之中。报告提出，要在2020年达到更高标准的小康社会，社会更加和谐。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实现“五个统筹”，要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中的重要思想，就是要实现社会各方面的和谐。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和谐社会这一重要概念。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从五个方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民主法治是发展的保障，公正正义是发展的价值取向，安定有序是发展的条件，社会活力是发展的源泉，人与自然和谐是发展的境界，这是我们党提出的全新的执政理念。

(一) 利益共享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看，利益共享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剩余价值思想包含利益分享、共享的内容，即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生产中，新的产品、新的价值是作为可变资本劳动力这个要素“制造”出来的，更确切地说，创造出来的新价值不仅超过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要多得多。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仅是转移原来的价值，丝毫不会增加价值，正是劳动力这个商品具有非同一般的使用价值，拥有它的人(即拥有活劳动的生产者)，理所当然地共享“价值增值”份额，分享创造出来的利润。

剩余价值学说是利益分享、共享、均衡的思想基石。在资本主义社会，正是“由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使得资本在雇佣劳动过程中生产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价值增值”^[1]。资本的拥有者——资本家仅凭资本这一个要素就掠夺了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工人、农民是分享不到自己创

造的利润的。利益共享分配制度应该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制度,即劳动力所有者理应与资本所有者共享企业的收益。利益共享分配机制是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劳动力要素和管理要素的综合,是根据这四者在生产中的作用进行的“红利”分配,这与资本家有本质不同。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资本短缺、资源严重不足,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来配置人、财、物资源,必然会凸显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人们围绕稀缺的资源和就业机会展开激烈竞争,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外资的大举进入也加剧了这种竞争。我国现在已进入就业高峰,就业形势比较严峻,新增劳动力就业困难,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问题突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同时,市场竞争会使社会阶层分化加快,并会不断拉大阶层间收入差距。市场竞争具有残酷性,一部分人会成为市场竞争的失败者,还有一部分人由于自己所拥有的经济文化等资源严重不足,结果成为社会弱势群体。而我国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两点:其一是公开、公正、透明;其二是利益分享和共享。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以利益共享为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现社会公正,消除三十多年来逐步形成的各阶层间利益上过于倾斜和失衡的问题,使全国十三亿多人各得其利,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观察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富强道路上处理好利益共享和利益分享是个难点,只有解决了这个难点的国家才能实现持续性的增长和发展。另外,我们讲利益共享不是不能容忍收入差距的存在,或者是要搞平均化。市场经济三要素是竞争、供求、价格,首要的是竞争,而每个人的天赋结构、经验、能力不一样,贡献给企业的利润大小不尽相同,因而每个人的薪水高低落差肯定会有,但差距过于悬殊,社会大多数成员就不能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利益不能共享不仅会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尖锐化,甚至还会导致政局不稳和政权更迭。众所周知,1960年至1980年期间的伊朗执政王朝的失败、2004年印度大选中人民党联盟的落选都是由于老百姓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也就是这些执政者忽略了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共享而陷于“发展陷阱”之中。巴西、阿根廷等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社会上每个人都有利益诉求,这是正常的、合

理的,也是推动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实现利益共享主要是针对利益过度分化而言的,目的是为了缩小悬殊的利益差距和实现社会和谐。”^[2]不应该出现一部分“社会精英”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另一部分弱势群体被社会遗忘的情况,更不能以多数人利益的损害为代价来成就特殊利益集团的急剧增长。

(二) 和谐社会的利益共享路径

分享和共享绝不是要搞平均主义。为和谐社会建立坚实的利益共享基础,国家需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增强利益共享的社会共识。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逐步形成利益分享和共享的全民共识,如果全社会成员没有分享的理念,人与人的关系就会产生隔膜;由于利益不均衡,各阶层之间以及同一阶层之间的每个人都不会有共同的价值观。只有形成“利益共享则共荣,利益独占则俱损”^[2]的局面,每个人才会去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并在社会发展中获得幸福感,从而达到和促进和谐的群际关系。当下,我们要克服经济增长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中心的认识偏差,为了持续发展,切实考虑环境的承受力,为我们的后代保护环境。同时,我们更要考虑我国城乡发展的协调以及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之间的均衡发展。

第二,提高整合社会利益冲突的能力。住房、教育和医疗价格不断上涨,成为国内居民提高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进程中的巨大压力,这三方面的支出大大增加,严重影响了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西方发达国家居民平均消费率为65%至79%,而我国仅为38%,这样使我国内需严重不足,只能依赖投资、出口发展经济,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切肤之痛。能不能实现利益共享与社会和谐考验着党的执政水平。我们必须以百姓的利益为视角,不仅使利益分享、共享全面得到贯彻,还要对出现的问题或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疏导;不仅要使压力得到合理释放,更重要的是制定政策时要具有前瞻性,能预见并出台相关措施化解矛盾。如江苏苏南的企业到苏北去,既克服了土地的紧张、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高的困难,又支持了苏北的发展。要努力避免社会阶层的固化,消除贫穷的代际继承,不能让越贫穷的人变得越贫穷,富有的人变得越富有。如果穷困是穷困的原因,这就陷入了“贫穷的陷阱”。因此,政府要促进收入分配的合理化,缓解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第三,创建有效的利益共享平台。减少失业、扩大就业是最好的分享平台。我国每年有近2000万人达到就业年龄,其中近1/3的人受过高等教育。随着农村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大量人口进城,这就需要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尤为重要。因为保障制度能够促进社会公平,它调节高收入者与低收入人群之间过高的薪水差距,具有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作用,这就能够大大弥补市场时常失灵的缺陷和先天的制度不足。我们还要尽可能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建立养老保障制度、失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

第四,改革和调整失衡的利益格局。一方面,要打破垄断行业的壁垒,让各方尤其民企进入并参与竞争。我们强调公平与高效的统一,在目前少数人财富膨胀太快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强调公平,强调分享与共享。另一方面,制度和规则缺失所造成的各种“寻租”机会使现阶段中国社会利益差距不断扩大,这就需要健全制度。改革是化解目前利益悬殊的最好办法。例如,通过个税制度调整,可以降低中低收入职工的税负;通过打通流通环节可增加种菜农民的收入;通过保障房建设制度可使低收入人群“居者有其屋”。

(三)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和谐社会建设

本着分享、共享发展成果的精神,中央作了若干政策决策。

一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三农”问题是实现利益共享必须克服的“顽症”。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三农”工作的新

理念、新举措、新任务,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具体化。

二是政策上创造就业机会,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是老百姓的收入来源,是家庭和个人一切其他活动、支出的基础,更是个人发展的平台。国家每年为大学毕业生创造的就业机会就多达几百万个。

三是促进教育公平,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有很多这方面的明确要求,我们要努力去践行。教育公平、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是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

和谐发展,集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五位一体,对于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地区、城乡、阶层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应该建立有助于和谐社会的价值观理论,而发展和谐社会的根本政治保证,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参考文献:

- [1]张英耀.关于构建和谐社会利益共享机制的思考[J].党史文苑,2007(5):41-43.
- [2]任德新.论和谐社会的利益共享基础[N].光明日报,2005-12-23(11).

基金项目:江苏规划办课题(09MLC007);江苏教育厅课题(09SJB880105)

(责任编辑:许成安 黄燕)

Perspiration from the Past, Inspiration for the Future: On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of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re always the key subjects studied by our party, with great achievements made. However, there still leaves some issues waiting to be recognized and resolv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m-Leninism is the process of emancipating the mind. For 90 years, the communist party keeps freeing its mind. With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he increase of social wealth, fairness and justice must b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so as to build up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leader; academic system of Marxism; Marxism; emancipate the mind; harmonious society; shared interest; scientific view of development